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賀瑞麟集

(上冊)

「清」賀瑞麟 著

王長坤

劉峰 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ING PROJECT



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文獻整理系列

賀瑞麟集 (上册)

〔清〕賀瑞麟著 王長坤 劉峰 點校整理

西北大學出版社

《關學文庫》組織工作委員會

主任 趙正永

副主任 江澤林 王莉霞 張豈之 陳國強 張祖培

執行副主任 徐 曄

委員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上官吉慶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華 江澤林 李 浩 李明遠 岳 亮

姜 鋒 馬 來 桂維民 徐 曄 陸柯倫

陳國強 郭大爲 郭立宏 張小寧 張社年

張祖培 張豈之 彭樹智 董 軍 趙正永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閻曉宏 權 儉

《關學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任 張豈之

副主任 趙馥潔 薛保勤

執行副主任 徐曄 馬來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美鳳 方光華 米文科 李似珍 李穎科

何惠昂 林樂昌 郝潤華 袁志偉 馬來

徐曄 高彥平 郭文鎬 陳戰峰 孫學功

曹樹明 許寧 張波 張萍 張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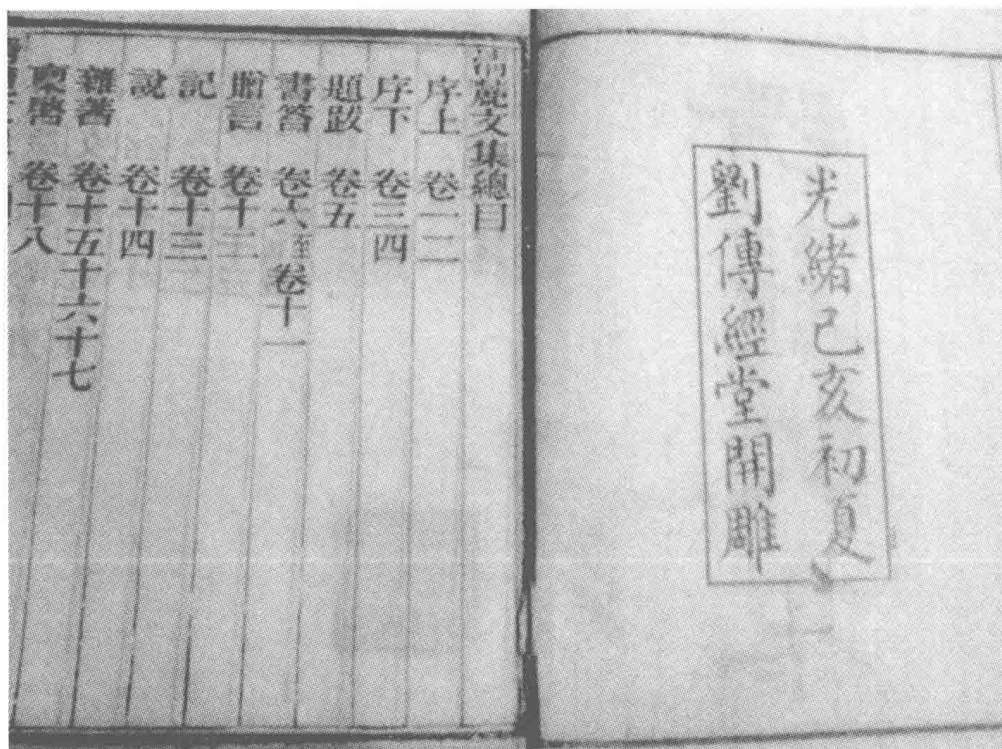
張世民 張豈之 楊建輝 路毓賢 趙瑞民

趙馥潔 劉學智 薛保勤 韓星 魏冬



復齋先生小像

清·賀瑞麟像



《清麓文集》清光緒二十五年劉氏傳經堂刻本

總序

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字子厚，宋鳳翔府郿縣（今陝西眉縣）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張載出身於官宦之家。祖父張復在宋真宗時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死後贈司空。父親張迪在宋仁宗時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死後，張載與全家遂僑居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講學，世稱橫渠先生。他的學術思想在學術史上被稱為橫渠之學，他所代表的學派被後人稱為「關學」。張載與程顥、程頤同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可以說，關學是由張載創立并于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在關中地區傳衍的地域性理學學派，亦稱關中理學。

關學基本文獻整理與相關研究不僅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重要課題，也是體現中國思想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重要舉措。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和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開拓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對上起於北宋、下迄於清末民初，綿延八百餘年的關中理學的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於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關學文庫即將出版發行之際，我僅就關學、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關學的思想特質、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等談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一、作為理學重要構成部分的關學

衆所周知，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與新階段，一般被稱為新儒學。但在新儒學中，構成較為複雜。比較典型的則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到「關學」這一概念。南宋朱熹、呂祖謙編選的近思錄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學發展的統緒，關學是作為理學的重要一支來作介紹的。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將張載的「關學」與周敦頤的

「濂學」、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並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禕等人纂修元史，將宋代理學概括為「濂洛關閩」四大派別，其中雖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們的思想內涵及其影響並不限於某個地域，而成爲中華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頁，即宋代理學。

根據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以及閩學代表人物朱熹對記載關學思想的理解、評價和吸收，張載創始的關學本質上當是理學，而且是影響全國的思想文化學派。過去，我們在編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學史上冊的時候，在關學學術旨歸和歷史作用上曾作過探討，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古代學術史考鏡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張載後學，如藍田呂氏等，在張載去世後多歸二程門下，如果拘泥門戶之見，似乎張載關學發展有所中斷，但學術思想的傳承往往較學者的理解和判斷複雜得多。關學，如同其他學術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源遠流長、不斷推陳出新的形態。關學沒有中斷過，它不斷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明清時期，關學的學術基本是朱子學、陽明學的傳入及與張載關學的融會過程。因此，由宋至清的關學，實際是中國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動態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創新性的概念，它開啟了清初王船山學術的先河。

關學文庫所遴選的作品與人物，結合學術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關學編及關學續編、關學宗傳等，均是關中理學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張載，下至晚清的劉光蕡、民國時期的牛兆濂，能夠反映關中理學的發展源流及其學術內容的豐富性、深刻性。與歷史上的關中叢書相比，這套文庫更加豐富醇純，是對前賢整理文獻思想與實踐的進一步繼承與發展，其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二、張載關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土後，有所謂「三教合一」說，主張儒、道、釋融合滲透，或稱三教「會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並舉的文化現象。當歷史演進到北宋時期，由於書院建立，學術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場所，從而促進了學人的獨立思考，使

他們對儒家經學箋注主義提出了懷疑，呼喚新思想的出現，於是理學應時而生。理學主體是儒學，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將它們融合為一個整體，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理學產生時起，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學學派。比如，在「三教融合」過程中，如何理解「氣」與「理」（理的問題是迴避不開的，華嚴宗的「事理說」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響）的關係？理學如何捍衛儒學早期關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觀點，又不致只在「善」與「惡」的對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與社會及個人有何關係？君子、士大夫怎麼做才能維護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又能堅持修齊治平的準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中宇宙觀與人生觀的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有一個統一的想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加以解決。宋代理學的產生及不同學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發展歷史的寫照，因而理學在實質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承創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時朱熹閩學各有自己的特色。作為理學的創建者之一，張載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在對儒學學說進行傳承發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北宋時期，學者們重視對易的研究。易富於哲理性，他通過對易的解說，闡述對宇宙和人生的見解，積極發揮四書義理，並融合佛、道，將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張載與洛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等人曾有過密切的學術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學術思想上相互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張載來到京師汴京，講授易學，曾與程顥一起終日切磋學術，探討學問（參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張載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為二程表叔，二程對張載的人品和學術非常敬重。通過與二程的切磋與交流，張載對自成一家人之言的學術思想充滿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因為張載與程顥、程頤之間為親屬關係，在學術上有密切的交往，關學後傳不拘門戶，如呂氏三兄弟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師道、游師雄、潘拯、李復、田腴、邵彥明、張舜民等，在張載去世後一些人投到二程門下，繼續研究學術，也因此關學的學術地位在學術史上常常有意無意地受到貶低甚至質疑（包括程門弟子的貶低和質疑）。

事實上，在理學發展史上，張載以其關學卓然成家，具有鮮明的特點和理論建樹，這是不能否定的。反過來，張載的一些觀點和思想也影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對後來的程朱學說及閩學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也是客觀的事實。

張載依據易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基本點上和易的原有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虛即氣」的觀點，認為沒有超越「氣」之上的「太極」或「理」世界，換言之，「氣」不是被人創造出的產物。又由此推論出天下萬物由「氣」聚而成；物毀氣散，復歸於虛空（或「太虛」）。在氣聚、氣散即物成物毀的運行過程中，才顯示出事物的條理性。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這個觀點去看萬物的成毀。這些觀點極大地影響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張載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間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處於宇宙之中。由於三者都是氣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歸根到底，萬物與人類的本性是一致的。進而認為，人們「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癯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裏所表述的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與張載有別，他們通過對張載氣本論的取捨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關思想，建構了「萬理歸於一理」的理論體系。在人性論方面，二程在張載人性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論。二程贊同張載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二程認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瑕的；「氣質之性」是氣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氣稟決定，稟清氣則為善，稟濁氣則為惡，正因為氣質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氣」的侵蝕而出現「氣之偏」，因而具有惡的因素。在二程看來，善與惡的對立，實際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

朱熹將張載氣本論進行改造，把有關「氣」的學說納入他的天理論體系中。朱熹接受「氣」生萬物的思想，但與張載的氣本論不同，朱熹不再將「理」看成是「氣」的屬性，而是「氣」的本原。天理與萬事萬物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朱熹關於「理

一分殊」的理論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又說：「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朱子語類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論包括一理攝萬理與萬理歸一理兩個方面，這與張載思想有別。

總之，宋明理學反映出儒、道、釋三者融合所達到的理論高度。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於兩宋時期。張載開創的關學爲此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張子正蒙注序論）船山之學繼承發揚了張載學說，又有新的創造。

三、關學的特色

關學既有深邃的理論，又重視實用。這可以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學風篤實，注重踐履。黃宗羲指出：「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明儒學案師說）躬行禮教，學風樸質是關學的顯著特徵。受張載的影響，其弟子藍田「三呂」也「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特別是呂大臨。明代呂柟其行亦「一準之以禮」（關學編）。即使清代的關學學者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依然守禮不輟。

其次，崇尚氣節，敦善厚行。關學學者大都注意砥礪操行，敦厚士風，具有不阿權貴、不苟於世的特點。張載曾兩次被薦入京，但當發現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毅然辭官，回歸鄉里，教授弟子。明代楊爵、呂柟、馮從吾等均敢於仗義執言，即使觸犯龍顏，被判入獄，依舊不改初衷，體現了大義凜然的獨立人格和卓異的精神風貌。清代關學大儒李顥，在皇權面前錚錚鐵骨，操志高潔。這些關學學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體現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

最後，求真求實，開放會通。關學學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較寬廣的學術胸懷。張載善於吸收新的自然科學成果，

不斷充實豐富自己的儒學理論。他注意對物理、氣象、生物等自然現象做客觀的觀察和合理的解釋，具有科學精神。後世關學學者韓邦奇、王徵等都重視自然科學。三原學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經典，強調用心求學，求其「放心」，用心考證，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獨立主見的治國理政觀念。關學學者堅持傳統，但並不拘泥傳統，能夠因時而化，不斷地融合會通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徵。由張載到「三呂」、呂柟、馮從吾、李顯等，這種融會貫通的學術精神得到不斷承傳和弘揚。

四、關學文庫的整體構成

關學文獻遺存豐厚，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涇野先生五經說、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代收入四庫全書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於陝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圖書館或民間，其中有的在大陸已成孤本（如韓邦奇的禹貢詳略、李因篤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殘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殘本，現重慶圖書館存有原書，國家圖書館僅存膠片；收入的南大吉詩文，搜自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周雅續）。即使晚近的劉光蕢、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傳亦稀世罕見。民國時期曾有宋聯奎主持編纂關中叢書（邵力子題書名），但該叢書所收書籍涉及關中歷史、地理、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內容駁雜，基本上不能算作是關學學術視野的文獻整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將張載集、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關學編（附續編）、涇野子內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學叢書陸續出版，這些僅是關學文獻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統梳理關學學術文獻仍系空白。

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後，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掘。

現在將要出版的關學文庫由兩部分內容組成，共四十種，四十七冊，約二千三百餘萬字。

一是文獻整理類，即對關學史上重要文獻進行搜集、搶救和整理（標點、校勘），其中涉及關學重要學人二十九人，編

訂文獻二十六部。這些文獻分別是：張子全書、藍田呂氏集、李復集、元代關學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張舜典集、馬理集、呂柟集、涇野經學文集、呂柟集、涇野子內篇、呂柟集、涇野先生文集、韓邦奇集、南大吉集、楊爵集、馮從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顥集、李柏集、李因篤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賀瑞麟集、劉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關學史文獻輯校。

二是學術研究類，其中一些以「評傳」或年譜的形式，對關學重要學人進行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郿縣張載、藍田呂大臨、高陵呂柟、長安馮從吾、朝邑韓邦奇、藍屋李顥、郿縣李柏、富平李因篤、郿縣王心敬、咸陽劉光蕡等學人，共十一部。它們分別是：張載思想研究、張載年譜、呂大臨評傳、呂柟評傳、韓邦奇評傳、馮從吾評傳、李顥評傳、李柏評傳、李因篤評傳、王心敬評傳、劉光蕡評傳等。此外，針對關學的主要理論問題與思想學術演變歷程進行研究，共三部。這些著作分別是關學精神論、關學思想史、關學學術編年等。

在這兩部分內容中，文獻整理是文庫的重點內容和主體部分。

關學文庫係「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得到了中共陝西省委、陝西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大力支持。文庫的組織、編輯、審定和出版工作在組織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日常工作由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和西北大學出版社負責。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對這一功在當代、惠及後世的國家和省級重大文化精品圖書高度重視，親自擔任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自始至終關心支持文庫的編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江澤林、副省長王莉霞和省政府秘書長陳國強等對文庫的編撰出版工作給予悉心指導；原陝西省新聞出版局長薛保勤、陝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主席趙馥潔、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主任張祖培對文庫的策劃與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庫歷時五年編撰完成，凝結著全體參與者的智慧和心血。總主編劉學智、方光華教授，項目總負責徐曄、馬來同志統籌全書，精心組織，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十餘所院校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協力攻關，精益求精，體現出深沉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責任感；他們孜孜矻矻，持之以恆，任勞任怨，樂於奉獻，以古人為己之學相互勉勵，在整理研

究古代文獻的同時，不斷錘煉學識，砥礪德行，努力追求樸實的學風和嚴謹的學術品格。出版社組織專業編輯、外審專家通力合作，希望盡最大可能提高該文庫的學術品質。作為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我謹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時間緊迫、經驗不足等原因，文庫書稿中的疏漏差錯難以完全避免。希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使用時加以批評指正，以便日後進一步修訂，努力使該文庫更加完善。

張豈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賀瑞麟（一八二四——一八九三）是清末繼李元春之後關學的重要代表，他恪守程朱之學，力辟陸王，盡力闡發濂、洛、關、閩宗旨，更著力躬行實踐。

一、賀瑞麟生平簡述

賀瑞麟，名均，字角生，號復齋，清末西安府三原縣人。其曾祖賀應祥，善畫工指筆。其父賀含章，一生且醫且商。賀瑞麟幼而岐嶷，自少便熟讀四書五經，勵志聖學。二十歲應鄉試，一舉奪魁，名播鄉裏。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二十三歲的賀瑞麟拜朝邑（今大荔縣）名儒李元春為師，自此「於周、程、張、朱書無不悉心究極，益憤志聖賢之學」（張驥關學宗傳卷五四）。

咸豐三年（一八五二），年屆而立的賀瑞麟已為飽學之士。然幾次科考，屢舉不售，於是築麻廬於父墓之側，名其「有懷草堂」，正式走上亦讀亦教的治學生涯。咸豐十一年（一八一六），劉映菁、劉映茁等名流賢士聯名舉薦其為孝廉方正，他上書堅辭，以明自己「無復仕宦之志」（賀復齋先生行狀，以下簡稱行狀）。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五月，陝西回變，賀瑞麟舉家避亂山西絳州。行至永豐鎮，因貌似回人，遭嚴格盤查。幸有渭南進士李應選解圍，賀瑞麟笑言：「貌似陽虎，孔聖且見圍焉，況吾輩乎？」（清籠年譜）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廢學，常與楊損齋朝夕相聚，談論學問之道。此外，還與楊損齋校正小學、近思錄。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賀瑞麟歸陝，助知縣余賡陽亂後重建，重修邑志，清丈土地，殫精竭慮。有鑒於此，邑侯鄉紳再以孝廉方正舉薦，但賀瑞麟均上書力辭。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賀瑞麟主講學古書院。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馬正和率回民義軍至三原，與崔偉所部匯合，

縱橫於渭北各縣，一時難民流離，餓殍遍野，賀瑞麟毅然聯絡親友、商賈、士紳，籌款施粥，夜以繼日約半載之久，全活甚眾，善名久播。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在門生劉東初的協助下，賀瑞麟於魯橋北門外購置清涼山坡地數十畝，建窑洞十余孔，收授生徒，並命名「清麓精舍」。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陝西學政吳大澂上疏薦舉，因其堅辭，詔給「國子監學正」銜。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縣令焦雲龍助其重修擴建清麓精舍，並常以學子身份前去聽講。另設（木板）印刷局、藏書洞三處。書院一改重功名之沿習，以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理念為辦學宗旨，由撫軍譚雲觀命名為「正誼書院」。正誼書院成就斐然，名播關中，為關中四大書院之一。

關於為學，賀瑞麟強調：「為學亦無他法。第一要路脈真，第二要功夫密。」（贈馬養之，清麓文集卷十二）因此格外重視讀書次第，其教育生徒，先以自編養蒙書授之，次小學、近思錄，再及四子（指周、程、張、朱），而後漸次以至六經。他認為，小學、近思錄當與四子並，而尤加親切，「學者如能篤信並謹守之，則一生受用必多」（行狀）。最後，又教以其所輯朱子五書、信好錄等。賀瑞麟訓迪諸生，誨人不倦，執掌書院期間所制定的管理制度異常嚴格，「關中自橫渠以來未之有」（行狀）。正是這種為學求道的執著與堅韌而吸引了眾多四方來學之士，其學術雖未開風氣之先，但在清末理學已陷低沉的情況下，頗有重振之功。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賀瑞麟卒於家中，享年七十歲。

二、賀瑞麟的學術思想及特徵

賀瑞麟針對清道光至光緒年間，學術思想上雖然仍以程朱理學為主，但是因為科舉之風所襲，時人津津於辭章利祿之學，功利之心氾濫，世道人心不古的思想態勢和學術之弊，以變末俗、正人心為追求，形成了以尊程朱而斥陸王、護正學而辟佛老、承繼弘揚程朱理學為主體的學術思想。

(一) 尊程朱而辟陸王

賀瑞麟年二十四時，已「謹守程朱主敬窮理之訓」(行狀)十餘年，此後益發不可改易，「一惟程朱是守」(上劉霞仙中丞書，清麓文集卷七)。他考察了明代以來學術思想的發展概況，強調明朱子之道的必要性。指出「明初尚朱子學，故人心正而風俗厚。以後異說汜濫，於是國運日衰。到清初，雖然朱子學重興，但時人並未掌握其精髓，故聖賢之道不彰。所以他認為，要不雜空虛偏謬之說，必須守孔孟之心法；要做到「以蕩檢踰閒為可恥，乞墮登壘為可羞」(程朱二先生行狀序，清麓文集卷一)，則必須深明朱子之道。賀瑞麟給朱子之學以極高的地位。他認為朱子的著作是為「千古學孔子者立之標準」，故「蓋求孔子必自求朱子始」(朱子行狀總論簡注序，清麓文集卷二)。又指出，朱子學是孔、孟、程、朱之道的嫡傳，其學要義「明誠敬義」正是初學入德之門。進一步，他堅定地認為，尊崇朱子之道，才是學術的真正之道：「竊謂千古學術孔、孟、程、朱已立定鐵案，吾輩只隨他腳下盤旋，方不錯走了路。」(答蔣少園書，清麓文集卷七)。可見，賀瑞麟是一位堅定的朱子學者，因此對陸王之心學辟之不遺餘力。

(二) 護正學而辟佛老

賀瑞麟繼承了張載關學力辟佛老的傳統，賀瑞麟說：「人事之修在於講明正學。」而「所謂正學者，亦不外四書六經之旨，孔、孟、程、朱之言。」(答張清寰書，清麓文集卷一)相反，「若外此而講學，夾雜二氏之說，則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更有甚於楊墨」。在他看來，「偽教者，二氏之說也」。既然是偽教，那麼程朱辟佛老與孟子辟楊墨，其意義就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救世。賀瑞麟認為佛教是「邪說」，其中之一就是講「地獄之說」。他指出，此說其實是為恐嚇「下根之人」而令其為善的說教而已，並不具有真理性。他強調對此絕不可相信，且要「掃除淨盡」，否則讓其存留於心中，會引誘人「眼邪口歪」，故「甚可怕也」。(與寇允臣書，清麓文集卷六)其二就是他似乎意識到「地獄說」的理論基礎是靈魂說，所以他進一步批判佛教的靈魂說。他說：「近世邪教只養個虛靈之心，謂之靈魂，卻說有天堂死後須歸去，都是誑人語也。」(答人問虛靈不昧死後歸於何處，清麓文集卷八)至於有沒有靈魂一說，他認為，「氣雖有聚散而其理不隨死而亡，蓋性者萬物之所同得，